臺大歷史學報第 55 期
2015 年 6 月，頁 219-249

BIBLID1012-8514(2015)55p.219-249
2015.1.12 收稿，2015.5.19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5.55.05

§研究討論§

從徐國琦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談美國學界對中美關係史研究的新取徑

吳 翎 君*

提 要

香港大學歷史系徐國琦（Xu Guoqi）教授新著《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為其完成「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三部曲」的專書之後，立基於國際史／跨國史的研究視野，提出以「共有的歷史」的取徑探討近代中美交往的共同歷程和經驗。回顧英文學界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脈絡，該書的書寫架構和研究方法別具新意。

近年來關於近代中美關係的研究似乎很難有突破口，從冷戰時代初期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到 1971 年孔華潤（Warren I. Cohen）《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在其交錯與接替的中美關係史論述中，費正清以「中國回應美國」，到孔華潤提出的「美國回應中國」，後續尚有柯文（Paul A. Cohen）論述「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柯偉林（William C. Kirby）闡釋「中國的國際化」，均致意於扭轉美國學界側重某一研究取徑的自我批判。姑不論徐國琦新著選擇的個案或解釋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其所展現的企圖心昭然可揭。本文討論美國外交史學界有關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轉向，並介紹本書如何將具體個案置於宏觀的國際史和中美關係史視野，以此闡述「共有的歷史」的研究取徑及其意義。

關鍵詞：中美關係　中國人與美國人　國際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E-mail: wlc@mail.ndhu.edu.tw.

前 言
一、從「美國中心觀」到「國際史」研究的文化轉向
二、「共有的歷史」的研究取徑與方法
結 語

前 言

香港大學歷史系徐國琦（Xu Guoqi）教授在 2014 年 9 月於哈佛大學出版新著《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以下簡稱《中國人與美國人》），[1]本書為其「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三部曲」專書[2]之後的最新力著。國際史大家入江昭（Akira

1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徐國琦於 1999 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2005 年始出版博士論文改寫的第一本專書《中國與大戰》（*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文版參見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此後接續出版《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西線戰場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文版見徐國琦著，潘星、強舸譯，尤衛群校，《一戰中的華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並自喻為「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三部曲」（以下簡稱「三部曲」）。這些研究論題的起源都可追溯自師從入江昭攻讀博士學位之際，為長期鑽研各國檔案並廣泛閱讀文獻的資深學者積久奮鬥的結果。詳見徐國琦，〈浮生三記〉，收入王希、姚平編，《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365-382。關於徐國琦所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三部曲」專書所闡釋的中國主體特色之國際史研究貢獻，筆者已有專文介紹，本文不再贅述。詳見吳翎君，〈從徐國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談國際史的研究方法〉，《新史學》第 22 卷第 4 期（2011，臺北），頁 183-215。關於國際史研究方法，亦可參見徐國琦，〈「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國際史研究方法及其應用〉，《文史哲》2012 年第 5 期（總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Iriye）在該書的序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共有的歷史，但如何闡釋『共有的歷史』需要謹慎引證，本書則展現了此一方法。」[3]徐國琦於〈緒論〉闡述該書要旨：「共有的歷史」可以是個人或群體分享同一段歷史事件的經歷，共有的歷史包含正面與負面的所有經歷，和平或衝突、合作或對抗、互惠或戰鬥等內涵；過去中美關係史的研究側重中美間的衝突、對抗與分歧，他則以個人或群體做為調和中美政治與文化關係的信使，探討跨越國境的文化理解與合作，並陳述中美不同文化脈絡下的共同願望和協力行動。[4]本書跨越時間從 19 世紀末到當代，從時間軸而言，可視為一部近代中美關係史；但各篇章節的橫向聯結則係以六個故事串聯，章章環扣，這六個故事個案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使團、留美幼童、戈鯤化（1838-1882）、古德諾（Frank J. Goodnow, 1859-1939）、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和體育活動。

近年來關於近代中美關係的研究似乎很難有突破口，從冷戰時代初期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5]到 1971 年孔華潤（Warren I. Cohen）《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6]在兩位學者交錯與接替的中美關係史論述中，費正清以「中國回應美國」，到孔華潤提出的「美國回應中國」，後續尚有柯文（Paul A. Cohen）於 1984 年論述「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柯偉林（William C. Kirby）闡釋「中國的國際化」，均致意於扭轉美國學界側重某一研究取徑的自我批

---

332 期，濟南），頁 5-17。

3 Akira Iriye, "Foreword," in *Chinese and Americans*, p. xii. 該書引文之中譯為筆者所譯，下同。

4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pp. 2-3.

5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st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該書於 1971、1979、1983、1989 年分別再版。

6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st ed. (New York: Wiley, 1971). 該書十年一修，最新一版為 2010 年第 5 版，書名略有不同：*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5th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判（下詳）。回顧英文學界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脈絡，「共有的歷史」可說是一種新的研究取徑，姑不論徐國琦選擇的個案或解釋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他的企圖心昭然可揭。

《中國人與美國人》出版時間距徐國琦 2011 年的《西線戰場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三部曲之三），雖僅三年，但前置的檔案蒐集和構思，則跨越十餘年之久，為作者將過去研究國際史的積累功力移轉至中美關係史論題的新作。近年來中美關係史的宏觀論著可謂沉寂之際，《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出版及其新穎的研究架構和方法，引發筆者欲藉此討論美國外交史學界有關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轉向，並介紹本書如何將具體個案置於宏觀的國際史和中美關係史視野，以此闡述「共有的歷史」研究取徑及其意義。

一、從「美國中心觀」到「國際史」研究的文化轉向

在美國外交史的學術傳統中，戰爭、衝突、霸權、外交決策、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等現實主義史觀曾是引領風騷的顯學，這一學派基本上係以美國為中心的歷史論述。以中美關係史而言，丹涅特（Tyler Dennett）出版於 1922 年的《美國人在東亞》（*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不僅是研究中美關係史的入門書，也是一再被學者引用的經典之著。[7]此外，從望廈條約以來，美國決策者如何看待中國及其遠東政策、美國如何介入中國的內政外交、美國商人和傳教士對近代中國現代化的意義、國共內戰和冷戰初期的美國對華政策等論題，這種環繞美國及美國人為主體

7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李定一所著的《中美早期外交史》大量援引丹涅特這本名著，見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識如何引爆、影響和促進近代中國的變革論，較具體的研究成果為 Ernest R. May 和 James C. Thomson Jr. 於 1972 年合編的《美中關係史論》（*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8]該書延攬當時最前沿的中壯學者，分階段針對近代美中關係的研究做了整體的文獻回顧和評述，迄今仍是研究此一領域極為重要的參考書。

提到中美關係史的通論研究，不能不提費正清所著《美國與中國》一書的開創性貢獻。過去兩岸學界對費正清都有所誤解，臺灣當局早期視之為共黨同路人，而不歡迎其入境，中共則稱其為美國現實主義和利益政策的代言人。然則，費正清對美國漢學界的重大貢獻已無庸贅言。[9]《美國與中國》一書也反映冷戰初期兩大陣營對峙的意識形態之爭，該書事實上為使美國人了解中國的通論讀本，前半部概括介紹傳統中國社會和政治文化，後半部探討西方衝擊及美國與近代中國的關係，闡述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以來美國對華政策，民國政治和國共兩黨的興起、內戰及國民黨的崩潰，並為美國在華政策的失敗辯白。費正清陳述美國對華政策的善意和特殊性，舉例而言，他認為 1942 年太平洋戰爭之初，美國對國民政府提供 5 億美元貸款，且無任何附加條件；由於中國仍在抗戰，這筆貸款不算是資助國民黨政府，當時的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一個總體動員的完整國家，美國因試圖挽救當時無能的執政黨政府而不幸捲入它的衰敗之中。[10]《美國與中國》是立基於西方中心觀

8 Ernest R. May, and James C. Thomson Jr., eds.,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 Surve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費正清在美國漢學界中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影響力幾乎無人可超越。不僅如此，他擅於學術行政和教育人才，在同輩或晚輩的學術領導人中亦難有人望其項背，哈佛東亞研究中心自他首創，培育出不少秀異俊彥，現亦多在美國學術圈擁有一席之地。費正清的弟子、日裔歷史學者入江昭認為，費正清在美國東亞關係領域裡的領導作用與中國學領域的作用同樣重要，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re Bergere）、畢仰高（Lucien Bianco）等人認為，他也是歐洲中國學的引導者。Paul A. Cohen, & M. Goldman, compiled,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82-186, 196-197.

10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如同氏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論述。[11]雖然費正清早於 1975 年已意識到西方中心觀的危險，提出中美交互作用的影響，[12]但多數美國學者可能不諳漢語和囿於文化因素的潛在意識，難以跳脫美國中心的研究路徑。

1971 年孔華潤出版《美國對中國的反應》，運用的材料不僅超過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且出版之際正值美國反越戰高潮，該書對美國遠東外交政策有所反省，也批判美國對華事務的自負心態和政策偏差。該書的重點仍在晚清以來不同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形成的考察，以及追溯此一政策形成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決策者等變因，闡釋美國對華政策之演變及美國人對重大中美關係事件的回應。本書奠定作者在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家之言地位，2010 年已發行至第五版，迄今仍是廣為學界使用的中美關係史通論。

純就美中關係的專著而言，包括費正清及後來的學者，普遍認為傳統中美關係有種特殊的情誼；它代表以門戶開放政策所孳生的一套指導原則，塑造美國政府為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之代言人的形象，使得中國朝野對於美國有較大的好感與依賴，以致過度評價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然而，對於美中特殊關係的系統化論述，一直要到 1983 年韓德（Michael Hunt）的《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 年的美國與中國》（*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13]始告大成。該書以具體案例闡釋一戰以前中美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特殊關係，主線有兩個：第一、美國政治人物（外交官）、商人、傳教士和公眾群體對於美國決策的影響。對華門戶開放政策是這些群體

11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2 John K. Fairbank, *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

13 Michael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共同信念，美國人相信在自由開放的競爭中，基督教信仰、西方資本和先進技術等「美國夢」可順利移植中國，正是這種夢想與美國對華外交聯繫起來，激發了門戶開放政策。第二、中國決策者對美國的政治主張和外交策略。中國朝廷大員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對中美合作戰略興致勃勃，提出聯美制英的手段。韓德以該書與 1987 年另一本專書《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在 1980 年代後期奠定國際關係史和美中關係史的學術地位。[14]

美國學界持續反省中國史的研究取徑，到了 1984 年費正清弟子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書中，更進一步呼籲研究同行擺脫「衝擊／回應」和「傳統／現代」的西方中心意識，應多從中國歷史的內在發展來看待中國歷史，該書側重「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的研究取徑，對美國學界的中國史進行全面反省，引起中外學界的熱烈關注，臺海兩岸和日本均有譯本。[15]晚近柯文以「重訪在中國發現歷史」（Revisiting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為題，回應了十餘年來對其肯定或提出質疑的一些作者的主要論點。他重申「中國中心論」的研究取徑係針對二戰以後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史研究方法論上的省思，該文並列舉數本側重中國內在歷史發展的英文代表著作，而這些著作正說明美國漢學界在研究視野上不斷努力的成果。他同時強調歷史學家應跨越任何形式的「種族中心觀」（ethnocentric），不論是西方中心或歐洲中心或其他。歷史學家的「他者」（outsideness）身分，應被賦予正面的使命意義，亦即從「從過去擷取事實」（To retrieve the truth from the past），真實面對過去，減少對歷史事實的扭曲。至於何謂「事實」（truth）與「真實」（reality）則是歷史學者需秉持高度自覺，

14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關於韓德的研究，可參考吳翎君，〈評 Michael H. Hunt 著，*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4 期（1998，臺北），頁 209-218。

15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斷反省的一項任務。[16]

就外交史學界而言，1980 年代以後，受到後現代主義史學和全球化思潮的衝擊，「去中心化」、「打破國家邊界」和追求普世性價值（universalism）等研究取向，使得一些外交史學者開始有所反省。他們感受到不能侷限於美國本身的價值觀和標準，也不能只仰賴美國方面的檔案，忽略他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視他國僅為被動地接受美國所做出的回應。[17]柯偉林從研究中德關係進而全面考察近代中國的發展，於 1997 年提出〈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一文，認為從中國的內部主體來看待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方法和視野，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深受國際化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民國時期的對外關係，可說是徹底穿透於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思想等各個層面，過度強調中國本土性的作用，不一定適用於深受西方影響下的近代中國。換言之，近代中國的發展，無法單獨就「中國中心」的特色做歷史表述，更不能忽略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因素。[18]

1990 年代以後，愈來愈多的外交史同好呼籲學界擴大研究視野，以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取代傳統外交史的研究典範逐漸勝出。入江昭在 1989 年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就職演說〈國際史〉（"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中，指出國際

16 Paul A. Cohen, "Revisiting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in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Ch. 7, pp. 185-199. 書名 "China Unbound" 刻意與其師費正清的《在華五十年回憶錄》（*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82]）巧妙對應。

17 王立新，〈試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化與文化轉向〉，《美國研究》2008 年第 1 期（北京），頁 26-46。

18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Reappraising Republic China" special issue, *The China Quarterly* 150, no. 2, (June 1997), pp. 433-458.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是一種全方位的歷史研究法，它拓展了傳統國際關係史一味強調政府之間的交涉和談判，將非政府層次的跨國交往也引入考察之列，並以整個國際體系作為參照，強調國家間的政治、文化等多重交流、對話及互動。[19] 1991 年，韓德任外交史家協會主席的演說中，以〈美國外交史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c History"）為題，闡述國際史研究的必然趨勢。[20]韓德近年出版的《美國的崛起：論美國如何統領全球》（*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一書，從全球化的脈絡宏觀百餘年來美國對外經濟擴張和「美國形象」的形成，特別是二戰以後美國縱橫於全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更對第三世界頤指氣使；然而美國優勢於 1980 年代以後在國內外都面臨一連串的挑戰，使決策者失去判斷力，特別恐怖主義的盛行，造成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該書雖仍不脫美國中心，但也留意到世界各國對美國經濟的回饋和全球化作用。[21]要言之，國際史研究強調跨越國家（Transnational）和國際（International）的交往，並非以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為研究旨趣，國際史研究仍離不開國家與國家間的對話，而是對話的對象更加廣泛。政府或非政府，群體或個人，影響及於國家和國際社會之間的交往都可能成為跨國聯繫和國境互動的一環。這樣一來，國際史的研究範疇無疑比傳統外交史更加寬廣許多。

就國際史研究的文化轉向而言，入江昭則是擺脫傳統政治外交史，倡導以文化因素分析外交史的代表性學者。他自 1960 年代後期即以研究美國與東亞政治關係而聞名，[22]到 1990 年代以後的系列著作愈來愈強調

19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no. 1 (1989), p. 4.

20 Michael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 *Diplomatic History* 15 (Winter 1991), pp. 1-11.

21 Michael Hunt,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22 入江昭早期關於美國與東亞關係的代表著作有：*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ep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超越中心觀的方法。入江昭指出一戰以後是文化國際主義全力發展的時代，大戰的毀滅性破壞，促使歐美知識菁英和藝文人士期望從教育、文化和藝術展演等方面，取代國際政治和軍備的競爭。[23]在《文化國際主義與世界秩序》（*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一書中，入江昭強調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主權國家形成的組織，如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由個人和私人團體所建立）對世界和平秩序做出的重大貢獻，而他特別措意後者可能超越官方角色，促進跨國諒解和文化交流。[24]他在《全球共同體：國際組織在現代世界成形中的角色》（*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進一步闡釋，全球共同體是以文化為基礎的一種世界主義，各種不同文化社群的相互尊重將可強化全球的互賴感；一旦能夠超越國家框架，便可超越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他同時將世界視為一個人類共同體，在權力、經濟與文化等多元因素共構的國際關係中，文化社群和非政府力量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5]入江昭和 Pierre-Yves Saunier 於 2009 年召集來自 25 個國家的 350 位學者，合編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0);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Chicago: Harcourt, Brace, 1967);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入江昭從遠東各國的多角視野，例如美、日、蘇和中國的交叉視角闡釋遠東關係，展現他對冷戰中期國際秩序低盪緩解的現實關注。

23 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4. Akira Iriye,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3, no. 3 (1970), p. 115.

24 Akira Iriye, "Preface," in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pp. ix-xii.

25 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1-3, 207-209. 以上關於入江昭學思之路的轉變，可參考〔日〕入江昭著，楊博雅譯，《我與歷史有個約會：入江昭治史心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劉克倫、石之瑜，《入江昭對世界與中國的中間主義立場——一種多元身份的知識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26]本書蒐集的論文主題都可以發展為專書形式，是一本研究跨國史和國際史的重要工具書，更加彰顯入江昭大力推動國際史的宏願。2012 年入江昭等人編撰的《人權革命：一個國際史的解釋》（*Human Right Revolution: A International History*）探討二次大戰以後到 1970 年初期國際間對於人權主張和法學理論的突破，例如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犯審判與人身權利的法學爭議、女權運動的發展、異議人士和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等等議題，不論宗教信仰、種族和性別所應享有的基本人權價值，是維護人類文明發展的國際參照系，各國和國際組織如何回應此一問題。本書回顧近代國際社會形成後做為文明典範的人權概念、演進歷程以及國際間的協調合作。[27]

如上所述，「國際史」拓展了傳統以軍事、外交為主導的「國際關係史」，它可以涵蓋個人、團體、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跨國活動，也包含文化、經濟、人口移民和訊息傳播等國際交流，但最後仍需回應國家或政府層次的意義探索。因此，國際史不僅可以運用於多邊國家之間，也適用於兩國關係。入江昭在倡導國際史的同時，也以中日兩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角色考察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他將 1989 年在「賴世和講座」（The 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的系列演講彙整為《全球視域下的中國與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可說是開啟國際史研究應用於中日關係的範例。他從「實力、文化和經濟」（Power, Culture and Economic）三個議題論述全球化脈絡下中日關係發展的三個階段：（一）1880 年代到一戰的國際競爭下，中日兩國在軍備軍力和戰略上的競爭；（二）一戰到二戰期間中日兩國同受 1920 年代文化思潮與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震撼影響。基於一次大戰對人類

26 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Basingstoke,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 2009).

27 Akira Iriye, Petra Goedde, and William I. Hitchcock, eds., *Human Right Revolution: A Internation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明帶來的巨大破壞，戰後中日藝文交流相當緊密，且日本政界不乏有人提出中日互存共榮的主張，反對用武力達到國家目的。他認為如果文化國際主義和經濟力在 1930 年代持續繁榮，可能就不會發生遠東危機。第三階段為冷戰迄今，經濟的角色日益重要。探討中日兩國在全球化影響下的經濟、貿易、投資和移民問題，最後強調中日兩國的未來和平將繫於兩國在文化上的互相依賴（cultural interdependence）和相互理解。[28] 這本書儘管只有一百餘頁，但備受學術界肯定。

徐國琦的研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入江昭的影響，《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顯然步趨入江昭以國際史視域詮釋中日關係的發想，但徐國琦提出以「共有的歷史」詮釋中美關係，則是另闢學術蹊徑。從近代中外關係而言，日本可能是觸動中國民族主義情感最深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近代美國對華關係則被喻為「改良的帝國主義」（Ameliorative imperialism）或一種特殊友好的關係。近代中日和中美兩國的關係，有若中國對外關係的光譜兩端，如何從國際史視域提出一套詮釋中美關係的架構和方法？從學術脈絡而言，徐國琦師承入江昭對國際史和「文化國際主義」的啟發，入江昭以宏觀論述見長，而徐國琦則以具體的敘事化個案匠心舖陳中美兩國的共同交往旅程。

二、「共有的歷史」的研究取徑與方法

正如入江昭所稱「所有的歷史都是共有的歷史」，但如何以具體論題展現此一宏觀意旨？徐著《中國人與美國人》即是提出了中美關係史研究的一種新的研究取徑與方法。「共有的歷史」可以是中美共同經歷的希望、沮喪、挫敗，掌握此一取徑將可擴展至其他主題的研究；它可以貫穿於文化交流、政府活動、商業夥伴、軍事合作、技術轉移等各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8 Akira Iriye,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層面，通過具體個案來探索與之聯繫的中國史、美國史以及中美之間的經歷和意義，找尋相互利用（bilateral exploited）、相互競爭、合作分享、衝突分歧等各方面的交往意義。

近代中美兩國的交往進程顯然有正面與負面的經驗，徐國琦的三部曲之一《中國與大戰》，以中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題，他深諳國際秩序中的衝突與對抗，但他在戰爭中看到東西文明的交融與近代中國建立新的國家認同的契機。同樣地，在《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中，徐氏強調正向意義的共享歷史，選取的個案側重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人物或事件，希望為未來的中美兩國和諧關係找到有效的歷史借鑑（頁 3）。本書挑選的案例，不少已被學者研究過，有些甚至是以專書呈現，那麼本書有何特別之處？為清楚讓讀者理解徐著如何掌握「共有的歷史」的研究取徑，有必要詳加介紹本書。

徐國琦曾自陳「共享的歷史」（shared history）概念源自入江昭對文化國際主義的主張，筆者認為 “shared” 一詞在英文比較中性，包含正反雙面，如譯成「共享的歷史」，在中文似有褒揚之意，較不能顯現中美交往中的各種正負力量和多元情境，故譯成「共有的歷史」較為恰當。[29]本書除緒章和結論之外，分成三部六章，第一部：19 世紀的信使；第二部：中國國際化與美國；第三部：大眾文化和中美關係。內容摘述如下：

第一部分，以蒲安臣使團、留美幼童和戈鯤化做為 19 世紀的信使。第一章〈蒲安臣使團：中國第一支赴洋使團〉。在清末推展洋務運動師法夷學之際，1868 年清廷聘用美國人蒲安臣為首任出使歐美各國公使，1872 年首次派遣幼童赴美留學，1879 年戈鯤化受聘到哈佛大學任教，這三件看似無關的事情，實乃環環相扣，且意義不凡。作者將這三個個案置於中美兩國個別歷史的發展脈絡，例如美國南北內戰時期的內憂外患

29 徐國琦，〈試論「共享的歷史」與中美關係史研究的新範式〉，《文史哲》2014 年第 6 期（總第 345 期，濟南），頁 27-39。該文簡短提到蒲安臣使團和留美幼童的案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艱難的戰後重建時代，而中國方面則是以為美國在華利益不大，對華最無野心，中美兩國比起他國利益衝突相對較小，以致蒲安臣的個人特質及其駐華公使任內推動「合作政策」得到清廷的信任，成為中國第一支赴洋使團的領銜代表。關於蒲安臣使團在歐美各國的遊歷，過去見諸使團隨行者志剛《初使泰西記》、斌椿《乘槎筆記》等文，作者則引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蒲安臣手稿和圖片，重建該使團在歐洲各國的遊歷情景，並引用著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對〈蒲安臣條約〉的高度評價（頁 25、62-63）。過去的研究可能側重蒲安臣對中國的貢獻，作者則兼顧蒲安臣使團在中美交流上的意義。例如：美國著名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的〈人生頌〉（"A Psalm of Life"），可能是第一篇被譯成中文的美國文學作品，中文潤飾者為總理衙門官員董恂（1810-1892）。董恂將譯文寫在一把扇子上，經蒲安臣送給朗費羅，這把扇子目前存放在朗費羅紀念館（The Wadsworth-Longfellow House）。蒲安臣以各種友善手段推進他和清政府官員的聯繫，最終贏得「中國的朋友」美稱。〈蒲安臣條約〉中有利於中國學子赴美留學之規定及促進中美邦交之友好，亦促成 1872-1881 年間約有 120 位中國幼童赴美留學的創舉。

第二章〈19 世紀留美幼童〉。關於留美幼童的研究迭有新著，但對於英文方面的資料掌握較少。[30]作者爬梳耶魯大學收藏的幼童赴美促成者容閎（1828-1912）文件、留美幼童的學習資料（存於康乃迪克州哈特佛〔Hartford〕的 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及 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原校已燒燬）和英文報紙文獻（如 *North China Herald*），重新檢視此一事件的意義。作者逐一比對這些幼童當時在校表現及其後來在

30 例如：Edward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1). Liel Leibovitz and Matthew Miller, *Fortunate Sons: The 120 Chinese Boys Who Came to America, Went to School, and Revolutionized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行各業的重要成就（工程界、外交界和教育界等方面），闡述幼童赴美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上所發揮的作用。這批幼童在康州哈特佛的良好學習和日後的傑出表現，影響了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也使美國人對通過教育來改變中國的企圖心大為振奮。幼童之一李恩富（Li Enfu 或 Lee Yan Phou）的作品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31]則可能是中國人在美國出版的第一本英文書，書中介紹中國的飲食、文化和信仰等特色，希望矯正美國人對陌生中國的誤會。

第三章，〈戈鯤化：美國第一位華人教席〉。作者不僅著力於這位在 1879 年攜家帶眷遠赴哈佛大學執教的傳統中國讀書人的傳奇故事，且細膩鋪陳促成此事的多位要角。戈鯤化祖籍安徽，曾試舉人不成，後任職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翻譯官，並在中國海關教導洋人中文。戈鯤化以教化洋人「東學西傳」的鴻圖大願來到哈佛，穿針引線的人士則有美國第一代漢學家衛三畏（或譯為衛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時任教於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校長伊利特（Charles W. Eliot，1869-1909 年任職哈佛校長近 40 年）、美國在華商人兼駐牛莊（營口）領事鼐德（Francis P. Knight）、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其中任職海關的哈佛高材生 Edward B. Drew 向伊利特校長的大力推薦更是關鍵。作者在本章中大量運用收藏於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的相關人士往來信件，以及美方報紙、海關資料，說明戈鯤化赴美任教之事並不容易，包括旅費籌款和薪資等細節都是一波三折。戈鯤化在哈佛大學穿著大清服飾，以傳授和譯介中國文學詩詞為使命。作者找到戈鯤化題給衛三畏的手跡「皇都春日麗，偏愛水雲鄉，絳帳遙相設，叨分鑿壁光」（頁 129），藉此說明這兩位在美國一中一洋的第一代漢學家聯手「鑿壁」漢學之光的情誼。戈鯤化在美不到三年，即因感染肺炎而病故，卻留下重大的資產，除了編撰華文教材，並有一批華文書籍成為哈佛大學及後來的哈佛燕京社奠定漢學研究的基本文獻。戈鯤化同時開啟了中美友好的聯繫，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31 Yan Phou Lee,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D. Lothrop Company, 1887).

例如美國詩人朗費羅曾致送他個人肖像，他的家中亦收藏有美國總統加菲爾德（James A. Garfield）的肖像。在 1870 年代美國各地已逐漸出現排華風潮之際，戈鯤化的傳奇故事更顯獨特。

第二部分：通過兩位美國知識界菁英古德諾及杜威探討一戰以後中美知識菁英的交流、美國顧問專家的角色以及中國的國際化歷程。

第四章，〈古德諾：一位美國在華顧問〉。袁世凱（1859-1916）的政治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古德諾，因著有《共和與君主論》一書，長期被視為替洪憲帝制背書，學界迄今對其評價有所不公。徐氏可能是為打破既有研究對古德諾的偏見，本章占全書最大篇幅（有 69 頁，全書共 332 頁），因而筆者必須用較多文字來介紹本章的新發現。作者利用卡內基和平基金會檔案（存放於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古德諾檔案、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董事暨前哈佛大學校長伊利特和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 1862-1947）的往來書信，重新挖掘這段故事。過去的著作指出古德諾接受卡內基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推薦，擔任民初政府的政治顧問，但對古德諾來華原委所知不多。作者提到伊利特曾於 1911-1912 年代表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訪問中國和日本，與袁世凱秘書蔡廷幹（1861-1935，第一批留美幼童）有所接觸，伊利特提議派遣美國顧問專家來協助中國。正是伊利特的積極努力，與留美幼童唐紹儀（1862-1938）和蔡廷幹、《泰晤士報》（*The Times*）駐京記者莫里遜（George E. Morrison）的聯繫，最後促成美國憲法顧問來華。作者仔細推敲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考慮推薦美國顧問來華之際，美國政府尚未承認民國政府（1913 年 5 月 2 日才正式承認），加以新建的共和政府草擬的憲法頗有以法國共和憲法為藍本的意圖，美國憲法顧問是否合適，曾使古德諾的派任一波三折。古德諾來華之前已頗具學術聲望，但不諳中國政情，來華前夕，被問及是否會將美國式民主移植至中國時，他表示需瞭解實情後再說。古德諾抵華後，中國政情瞬息萬變，「二次革命」發生後，古德諾發表〈中華民國憲法案

之評議〉表示：「夫今日中國所最重要者，在有一強固之政府。政府之政策必使之見諸施行。國會僅可為普通之監督，不宜嚴重干涉，使政府不能為遠大之計劃。」[32]這篇言論傾向於總統的權限不可過度受限於國會。古德諾在致巴特勒校長的書信中表明，他認為美式的共和形式不適用於中國，對民國政府的憲政藍圖他自有理念，同時他個人對袁世凱的政治權力頗有信賴感（頁 174-175）。當時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回憶中也提到，古德諾向他表示中國實施內閣制的條件尚未成熟，不贊成全盤採行西方的制度，然而「袁世凱也常利用美國專家，一旦他想提出加強自己政權的方案時，便說古德諾和外國顧問們已經贊成」（頁 186）。由於中國政局擾攘不安，古德諾本人深懼捲入中國政治問題，因而 1914 年 1 月當他有機會出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時，儘管年薪低於北京政府顧問的優渥待遇，仍迫不及待求去，時距 1915 年 8 月中旬帝制運動尚遠。後來古德諾等外籍顧問的意見卻被大量用來宣傳和支持袁的帝制活動，而反帝制人士諸如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也稱第二次變更國體之議，「就表面觀之，乃起於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抨擊古德諾雖為外國博士，「其透闢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33]袁稱帝之後，古德諾確曾收到袁世凱委託蔡廷幹送去的一對雍正時代花瓶，並表示感謝，也曾收到袁內務大臣周自齊的感謝狀。那麼，如何看待古德諾在中美關係史的定位呢？古德諾在哥大的同事，也是著名歷史學家畢爾德（Charles A. Beard），在古德諾擔任美國政治科學會職務二十五年的紀念年會中，盛讚其對美國政治社會科學的開創性貢獻，但隻字未提他在中國的事蹟，從這點來說，古德諾在中國的任務無疑是失敗的。從中美文化的交流貢獻而言，作者提出以下看法：首先，民初的外國顧問事實上是「顧而不問」，古德諾曾向巴特勒表示急欲離華的理由之一，是他覺得不受北京國會重視。作者

32 古德諾，〈中華民國憲法案之評議〉，收入王健編，《西法東漸——外國人與中國法的近代變革》（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頁 117-122。

33 梁啟超，《盾鼻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第 2 冊，頁 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為做為一名外籍顧問，古德諾確是善盡顧問之責，更在中美關係和菁英群體間扮演信使角色，他將西方的法學知識傳播到中國，更重要的是他讓美國政府和人民了解正在轉變的中國，和對未來中國憲政方向提出建議。其次，身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和美國政治科學領導人物，古德諾持續教導美國人理解中國，在美國各地演講，介紹他所認知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並曾出版 *China: An Analysis* 一書，徐氏表示：「我們從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分析，反而可以明白他何以認為君主立憲政體適用中國的想法。」（頁 201）本章文末，作者刻意戳刺當前一黨獨大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沒有立場批判所謂古德諾的憲政謬論，百年之後的中共更該自我反省當前中國的憲政改革和民主法治。

第五章，「杜威：西方孔子和文化使者」。1919 年 2 月杜威訪華是民初學術界的盛事。杜威對近代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已有許多學者研究過，此一面向非作者所重，作者將杜威訪華的時機置於歐戰爆發後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美國威爾遜主義所釋出的對華友善的國際背景。過去杜威在中國的事蹟多透過中文的二手傳播，並未深究杜威本人及促成其訪華相關人士的往來資料，甚至可以說因胡適（1891-1962）等人的大力喻揚，而淹沒了這位不諳中文的「西方孔子」的真實面貌，究竟杜威來華前後對中國有怎樣的想像，他在中國的形象又是如何打造出來的？作者利用哥大保存的杜威檔案，剖析杜威訪華時的心態。杜威在歐戰對西方文明帶來強大破壞力的心理陰影中造訪陌生的中國，百感交集且不知所措；待杜威抵達中國後，感受到中國人對巴黎和會的熱情，他認為中國不僅是學習國際政治和東方文明的好場域，他也開始熱切地想了解中國，而不是以指導師的身分來教育中國。杜威在中國四處以英文演講，事實上他不擅於詞令，但在中國受到一批留美學人的大力簇擁和吹捧，這些人是當時知識界和文化界的風雲人物，如胡適、蔣夢麟（1886-1964）、陶知行（1891-1946）、郭秉文（1879-1969）等杜氏子弟。杜威的英文演講稿大量被譯介在中國的《晨報》、《新青年》等新銳媒體，杜威演講集和杜威專號熱烈刊行，一時之間造就杜威實用主義的熱潮。

有趣的是，作者從資料中研判，原本杜威只想在中國做短期訪問，但後來延長到二年餘，可能中國給的待遇不低也是因素之一。杜威在 1904 年從芝加哥大學退休後，到 1909 年時才發現芝大欠他 416.62 美元，他為此事和哥大校長巴特勒有一簍子的牢騷信和長達十年的追討過程，其原委固然基於程序正義，杜威對金錢應頗為計較（頁 210）。此一說法並無貶抑杜威人格之意，而是展現歷史學家求真求實的精神。作者也提到杜威在延長第二年聘期時曾表達在中國有未竟之願，特別是推動「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教育改革。杜威和親友往來書信顯現他對改造中國的熱情和使命感，而他與女兒的書信中更坦言中國的特殊經歷確實拓寬和改變了他的美式哲學思考（頁 229）。從中美共有的歷史而言，杜威對中國是觀察者，是民初知識界的指導師，但中國的儒道哲學深深影響他既有的教育哲學思想。杜威自評其在中國的角色為「調合兩種不同的文明，並分享一些價值」（頁 230）。作者於文末展現他對當前中國的關懷，提到 1950 年代杜威思想被打成反動，胡適留在中國的兒子胡思杜（為紀念杜威而有此名）後來被迫自殺，杜威思想噤口不能言。中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倡導「實事求是」、「摸著石頭過河」，似乎又讓人嗅到杜威風潮的復甦；復旦大學且於 2005 年成立「杜威研究中心」，作者呼籲此其時應是重新理解杜威思想在中國的絕好時機（頁 231）。

第三部分：大眾文化和中美關係。第六章探討「共享的外交歷程：體育活動」。作者所撰三部曲之二的《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通過近百年來中國如何看待體育、對現代體育觀念的認識以及中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經歷等主題，闡釋近代中國人如何利用體育活動來改變中國人的命運和參與國際化的軌跡。在過去的研究基礎上，作者重新梳理近代中美兩國在體育活動方面的共同經歷。本章從 1895 年美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於天津設立分會，開始大力推展籃球、排球等現代體育競技活動為始，陸續討論以下議題：1910 年在 YMCA 的指導下，首屆中國奧運會得以

舉行；1932 年中國第一次參加第十屆洛杉磯奧運，運動員劉長春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1949-1979 年海峽兩岸「兩國中國問題」浮現在奧運代表權的外交角力。本章尤著墨 1970 年代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乒乓外交開啟與美國政府的破冰之旅，以及美蘇共三方在國際體育活動中呈現的緊繃外交關係。作者利用卡特總統圖書館（Carter Presidential Library）最新解密的一批檔案資料，重新論述乒乓外交在中美建交關係上的作用。主要觀點為 1979 年北京重返奧運和其他世界主要體育賽事後，急欲向西方展示一個開放的新中國，並爭取更多國際友邦和提昇國際地位；但就在 1979 年莫斯科取得奧運舉辦權之際，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總統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呼籲各參賽國家抵制莫斯科奧運，在此一詭譎的國際政治氛圍下，中共領導人華國鋒（1921-2008）竟公開響應美國的抵制行動。由莫斯科奧運的問題看出當時中蘇關係的冷凍以及 1979 年 1 月中美建交後一個全新外交時代的來臨（頁 249）。1984 年洛杉磯奧運，中國射擊選手許海峰史無前例地獲得第一枚金牌，成為國家英雄；當屆中國共得 15 枚金牌，中國人進一步瘋狂追尋金牌數，欲藉此證明中國不僅已擺脫「東亞病夫」，更是世界體育強國。2008 年，中國於北京首次主辦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會前主席 Juan Antonia Samaranch 盛讚這是「前所未有的好競賽」，寫下中美共享歷史的轉捩篇章（頁 257）。中國在 2008 年北京奧運獲得的金牌數為世界第一，會後美國人杜撰「中美共治」（Chimerica）一詞，戲稱日後中美要分享金牌大餅，但美國於 2012 年倫敦奧運重登擁有世界最多金牌的國家，中國居次（頁 258）。作者認為儘管中美兩國將持續爭逐奧運金牌的排名，但更重要的是雙方應記取中美兩國自近代以來通過體育活動展現的和平友誼，以中美共有的歷史經驗來確保未來的攜手合作，而非一味地較勁。

承上所述，《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中「共有歷史」的研究方法和書寫架構，大致可歸納如下：（一）以中美兩國互為主體，梳理具體個案於該國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現象淵源的回溯。（二）個案發生的理由、動機和牽繫此一中美交會的關係網絡。（三）闡述具體個案在中美關係

史的交互作用及雙向意義。（四）跨領域和多層次書寫，將文化、教育、經濟、政治、體育活動和國際組織等元素融於一爐，並關注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社會流動。（五）以國際體系為參照點，詮釋中美交往的歷史意義，特別是針對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命題。此一研究取徑和方法必須會通中美兩國的歷史，嫻熟利用中英文檔案和文獻。筆者以為在檔案資料取得愈來愈便利的時代，特別是數位資料庫的運用，為研究者帶來莫大的便利，研究者如能善加運用中英文材料，並且在研究視野和方法上有所突破，仍可找出不少具體案例重新審視中美交往的共同經歷。不僅是徐著所挑選的文化議題，其他包括經濟、商業、技術的交流，甚至傳統政治外交的議題，都可藉由「共有的歷史」研究取徑，舖陳故事新說。[34]

結　語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係以個案方式串聯 19 世紀到當代中美共享的旅程和經驗。就國際政治而言，事實上歐洲列強在 1892 年始將駐華盛頓的外交使節由公使升格為大使，如同 Paul Kennedy 所言，到一次大戰前夕，美國至多是徘徊於強權體系邊緣的國家，歐洲主要國家並不把美國視為影響國際權力均衡的一個砝碼。[35]中美兩國國際地位的相對弱勢，形成 19 世紀交往的共同背景。〈蒲安臣條約〉和赴洋使團為此一共

34 可參見吳翎君，《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吳翎君，〈清末民初中美版權之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8 期（2012，臺北），頁 97-136；Wu Lin-chun, "One Drop of Oil, One Drop of Bloo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oleum Problem in Wartime China, 1937-1945,"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 (October 2012), pp. 27-51. 吳翎君，〈歐戰爆發後中美經濟交往的關係網：兼論「美國亞洲協會」的主張〉，《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43 期（2015，臺北），頁 179-218。

35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Hyman Limited, 1988), pp. 194, 248-249.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通意識下的產物，但它卻開啟了近代中美友好關係的傳統，幼童留美和戈鯤化赴美任教直接受惠於當時中美友好的情誼。古德諾和杜威兩人代表一次大戰前後中美兩國知識菁英共同探索憲政改革的方向和追尋文明價值的精神，美國人企圖改變中國的同時，中國也提供了西方知識菁英實踐思想的實驗場域和對行動知識的反思。最後，作者以近代中國參與國際體育活動來回顧中美共同的經歷，尤其著重奧運代表權上的外交角力、中美建交及其後攜手抵制莫斯科奧運的策略。

如本文所述，費正清以來關於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脈絡，從美國中心觀、中美交互作用、國際史研究趨勢和國際史的文化轉向，此一學術脈絡的演變似有跡可循，顯現西方學者擅於提出獨創性的觀點，闡釋被人忽略或挑戰既定的說法，甚至更具有企圖心地建立獨樹一格的研究取徑。筆者認為本書選擇的個人、群體或國際組織的案例，係由國際史轉變而來，此一研究取徑或可供後學者參考。至於這些個案是否合適，可能見仁見智，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亨利・盧斯（Henry Luce, 1898-1967）、林語堂（1895-1976）等人的重要性似不亞於本書所舉個案。但徐國琦在〈緒論〉已說明本書個案旨趣為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費氏學派強調紮實應用檔案和文獻資料，一路相承，入江昭為費正清的弟子，徐國琦則為費正清的再傳弟子，在此一學術譜系中都是以利用檔案文獻起家，試圖建立自己的研究典範。

在國際史的著作已蔚為一股風潮之際，西方學界的國際史研究仍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史和跨國史研究，徐國琦的國際史研究與西方學界最大的不同是他擅於運用多國和多元檔案的交叉論證，並以具體個案闡釋近代中國與國際體系的對話。在他撰述「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三部曲專書中，展現中國化（internalization 或譯內化）與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雙重軌跡，他以中國參與一次大戰、非政府組織（體育活動）、中國派赴歐洲戰場修築防禦工事的華工為主題，通過多國檔案的比較和全球視野，探索中國式國際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人尋找新的國家認同的歷史軌跡。這本《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史》，一方面挑戰美國學界側重美國中心的論述，另一方面批判中國大國崛起後的中國中心論。最後，讀者仍可看到他不時叩問近代中美交往的歷程中「何為中國」的意義，中國應找尋自我國家認同的定義，並非以西方或美國做為競爭參照。就此而言，徐著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史和中美關係史的研究特點，更加突顯其系列著作在英文學界的貢獻。[36]

「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美國學界治美中關係史的學者對當代國際政治的現實關懷特別深刻，此一傳統從費正清學派以來不論研究典範如何改變，治外交史者對當代世界的觀察及未來中國局勢的演變特別敏銳。反觀臺灣歷史學界在這方面則相對保守和拘泥，乃至於外交史研究與現實國際政治的接合漸行漸遠，以致外交史學界擁有史學縱深的功夫底蘊，卻逐漸失去對當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入江昭以日裔學者研究美國與東亞關係，最早提出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的建構，倡議美國需要在東亞與其他大國合作，以形成穩定亞洲的特定秩序，他同時深刻反省日本對於亞洲身分的認同將有助於中日合群和亞洲共同體的形成。晚近入江昭一再強調教育文化與國際組織的功能，認為以文化為基礎的力量，將有效強化不同文化的信賴感，驅使世界走向全球共同體的未來。入江昭擅於從不同面向的觀點來詮釋國際關係，很少著眼於具體個案的研究，徐國琦的《中國人與美國人》則以微觀個案填補入江昭對於東亞和平秩序和文化國際主義的理論設想。筆者認為身為華裔學者的徐國琦，在《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中的現實關懷呈現中國崛起之

36 近年來，由中生代的學者接力出版「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或「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研究成果頗受學界關注，但仍為「美國中心」的國際史論述。例如：David Armitage《作為國際史的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為探討美國立國經典文獻〈獨立宣言〉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Erez Manela 所著《威爾遜時刻》（*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則探討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秉持國際主義理想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之設想，對埃及、中國、印度及朝鮮等地的深刻影響。

後，中美兩國隱然有種相互對抗和競爭的心態，徐氏希望通過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個案經歷，建構出中美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的心理認知和共同願望，而非完全依賴國家力量主導一切。在 21 世紀中美兩國如何形成一個和諧共享的價值觀和構建互信渠道，求同存異，走出一味競爭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理解正可提供未來的借鏡。

最後，本文想說明的是，美國的政治外交史學界仍不乏推陳出新之作，不僅冷戰史研究迄今仍占有一席之地，[37]軍事和戰爭史的研究亦有復甦跡象，但不論如何，以國際史和全球史的視野重新書寫戰爭經歷則為一種趨勢。2014 年為一戰百年，一次大戰史權威、耶魯大學教授溫特（Jay M. Winter）主編的《劍橋一次世界大戰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三大冊響亮問世。溫特這套一戰史新論，從全球史觀點闡釋一戰對捲入其中的三十餘國及殖民地的影響，探討大戰前後各參戰國之損益及其對大戰貢獻等議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主持的「一次世界大戰國際百科全書」（*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英文線上資料庫），除了闡述歐洲主要參戰國之外，也含括過去被忽略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所動員的非洲和東南亞等殖民地國，以及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從全球史和跨國史的意義重新書寫一戰。再者，關於戰時人民生活和心靈狀態、戰爭暴力體驗、戰俘營的處置、大眾傳播媒體、文化精神現象、婦女地位和戰爭究責等跨國議題，以及全球在各方面層次的交互作用影響均受到關注，此一結果也說

37 冷戰視野的全球觀點，較具代表的專書如：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該書運用多國檔案探討冷戰時代美蘇兩大強權的意識形態對抗及其對第三世界的干預，從冷戰初中期的古巴革命和越戰、南非、衣索比亞（Ethiopoa）及中東問題，跨越雷根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政策，以迄於戈巴契夫的垮台和蘇共解體，冷戰時代告終，闡釋革命、干預、霸權政治和世界動盪不安的源頭。M. P. Leffler, & O. A.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則收錄有 23 篇論文，闡釋冷戰時代美、蘇兩大巨頭以及英、德、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巴爾幹地區和中歐東部等全球不同國家／區域間的衝突，同時探討核武競爭、去殖民化浪潮、石油資源爭奪和文化冷戰等議題。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了國際史研究正走向更寬闊的議題發展。[38] 2015 年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歐美學界大張旗鼓地省思這段人類共同的歷史悲劇。在重新思考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時，「共有的歷史」的概念和研究取徑提供一個全新的學術視野。戰爭固然屬於衝突範疇，但世界大戰更應該從共有的歷史視野去解讀，它畢竟是人類共同經歷的歷史磨難。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和編輯委員會提出寶貴的修正意見，使作者做了更周延的修訂，謹此深致謝意。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張瑞德於研討會中惠賜意見，亦一併致謝。然拙文如有不足與舛誤之處，全責在於作者。謹以本文祝賀恩師張玉法院士八秩華誕。

（責任編輯：歐陽宣　校對：石昇烜）

38 Jay M. Wint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一次世界大戰國際百科全書」線上資料庫（*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ttp://www.1914-1918-online.net/ [accessed February 1, 2015]）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所主持建置，總主編為該校 Olive Janz 教授，自 2011 年起號召全球超過五十餘國二百多位學者共同參與，詞條經嚴格學術審查始得刊登，自許成為全球最大、最具權威的一戰資料庫（陸續建置中）。東亞部主編為徐國琦和日本京都大學山室信一教授。

引用書目

一、研究專著

王立新，〈試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化與文化轉向〉，《美國研究》2008年第 1 期，北京，頁 26-46。

古德諾，〈中華民國憲法案之評議〉，收入王健編，《西法東漸——外國人與中國法的近代變革》，頁 117-122。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吳翎君，〈評 Michael H. Hunt 著，*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4 期，1998，臺北，頁 209-218。

吳翎君，〈從徐國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談國際史的研究方法〉，《新史學》第 22 卷第 4 期，2011，臺北，頁 183-215。

吳翎君，〈清末民初中美版權之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8 期，2012，臺北，頁 97-136。

吳翎君，《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吳翎君，〈歐戰爆發後中美經濟交往的關係網：兼論「美國亞洲協會」的主張〉，《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43 期，2015，臺北，頁 179-218。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徐國琦，〈浮生三記〉，收入王希、姚平編，《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頁 365-38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徐國琦，〈「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國際史研究方法及其應用〉，《文史哲》，2012 年第 5 期（總 332 期），濟南，頁 5-17。

徐國琦，〈試論「共享的歷史」與中美關係史研究的新範式〉，《文史哲》2014 年第 6 期（總第 345 期），濟南，頁 27-39。

梁啟超，《盾鼻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劉克倫、石之瑜，《入江昭對世界與中國的中間主義立場——一種多元身份的知識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

〔日〕入江昭著，楊博雅譯，《我與歷史有個約會：入江昭治史心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Armitage, Davi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hen, Paul A., & M. Goldman, compiled.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hen, Paul A.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utledgeCurzon, 2003.

Cohen, Warren I.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st ed. New York: Wiley, 1971.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5th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Dennett, Tyler.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Fairbank, John 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st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Fairbank, John 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Fairbank, John K. *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Hunt, Michael.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Hunt, Michael.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Hunt, Michael. "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 *Diplomatic History* 15 (Winter 1991) , pp. 1-11.

Hunt, Michael.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Iriye, Akira.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epr.,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0.

Iriye, Akira.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Chicago: Harcourt, Brace, 1967.

Iriye, Akira.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3, no. 3 (1970), pp. 115-128.

Iriye, Akira.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Iriye, Akir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no. 1 (1989), pp. 1-10.

Iriye, Akira.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Iriye, Akira.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riye, Akira.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Iriye, Akira,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Basingstoke,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 2009.

Iriye, Akira, Petra Goedde, and William I. Hitchcock, eds. *Human Right Revolution: A Internation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Hyman Limited, 1988.

Kirby, William C.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Kirby, William C.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Reappraising Republic China" special issue, *The China Quarterly* 150, no. 2 (June 1997), pp. 433-458.

Leffler, M. P., O. A.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Leibovitz, Liel, and Matthew Miller. *Fortunate Sons: The 120 Chinese Boys Who Came to America, Went to School, and Revolutionized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2.

Manela, Erez.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y, Ernest R., and James C. Thomson Jr., eds.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 A Surve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hoads, Edward.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1.

Westad, Odd Arne.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Winter, Jay 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Wu, Lin-chun. "One Drop of Oil, One Drop of Bloo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oleum Problem in Wartime China, 1937-1945."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 (October 2012), pp. 27-51.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譯本：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ss, 2008.

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譯本：徐國琦著，潘星、強舸譯，尤衛群校，《一戰中的華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二、網頁資料

Janz, Olive, ed.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ttp://www.1914-1918-online.net/(accessed Feb. 1, 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5 (June 2015), pp. 219-249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5.55.05

Xu Guoqi's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and the New Approach i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Wu, Lin-chun*

Abstract

Professor Xu Guoqi is the author of a trilogy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books of modern China. Now he has published a new book titled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This new book goes beyond the earlier international / transnational history by introducing a new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o study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amely the "shared history" approach. Xu's groundbreaking approach provides a fresh understanding of the shared histor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s as well as the other historical fiel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has been lacking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approaches for a quite long time. John King Fairbank's landmark boo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 and Warren Cohen's long-standing *America's Responses to China* (1971) both focused on the United States ei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U.S. in Fairbank's case or America's responses to China in Cohen's case. To correc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sponses" approach, Paul Cohen suggeste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No. 1, Sec. 2, Da Hsueh Rd., Shoufeng, Hualien 97401, Taiwan (R.O.C.);
E-mail: wlc@mail.ndhu.edu.tw.

in the 1980s that we study China from a China-centered approach, William Kirby in the 1990s proposed a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However, these approaches all had shortcomings of their own. Xu Guoqi's new approach, however, seems to be more ambitious than the others and might represents a major breakthroug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Xu's new book and his new approach of the "shared history" perspective.

Keywor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inese and Americans, International Hist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